

以媒介为支点,哲学想撬动什么?

■邹广文

将来回顾起来,“元宇宙”应该是2021、2022的年度关键词。虽然其生命力几何,最终要看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自2021年秋天扎克伯格将Facebook(脸书)的母公司更名为Meta之后,元宇宙(Mataverse)的热度就溢出科技和社交媒体圈层,逐渐成为了一个公共概念。资本巨头纷纷入场,游戏企业蓄势待发,社交媒介掀起新的讨论热潮。虽然至今尚无人能示范性地给予它以明确的定义,但其指向已经有了一个大概轮廓:一个有系统商业和社会规则的沉浸式虚拟空间,平行于物理空间,每个人都可以以一种赛博人的方式在那里进行新的生存,甚至构筑属于自己的“文明”。

不是科幻小说,也并非一个数字乌托邦,而是正在降临的生活。想想看,刚刚更名的脸书用户是地球上近一半的人口,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帝国;微信月活突破十亿,将地理上的庞大疆域浓缩进了一个线上社群,媒介早已有了创造一个独立空间的潜力。现在它又有了更大的“雄心”,用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的方式,把人们关于元宇宙的复杂讨论化约一下,不就是这个结论么——

“媒介要创造宇宙!”

而人们目前兴奋与茫然交错的心境,就如同他在新世纪初最后的哲学作品之一《冷记忆4》所描绘的一样:

“这只是个开头。我们是土著

人,是虚拟时代的类人猿——在宇宙历史中刚刚处于火的发明和直立行走阶段。从逻辑上讲,我们还有待于被一种更强大的统治力量开发和殖民。”

像箴言也罢、像谶纬也好,鲍德里亚晚期的著作就是如此——不再进行传统的概念考证和哲学论证,而是以散文、游记、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反本质、反建构的写作。然而,这反而使他的媒介批判有了一种先知般的预言感。正如刘文嘉这本前沿研究新著《拟真化生存》所言,当人类整体性地进入线上化生存,同时这种生存方式还未经过充分的哲学反思,我们确实应该关注鲍德里亚所选取的媒介“支点”,看看他在撬动什么?

一方面,他可能想用媒介来撬动我们对本体论的理解。

本体论作为哲学思考的第一追问,它探求的是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即寻找“存在”本身,致力于建构一般存在与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柏拉图所追问的万事万物背后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心念念的最高“实体”,都是经典的本体论建构。古希腊经典的本体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实体是先验的,是已成之物,命定之物,因此是时间之外、逻辑在先的。

上述本体论的建构方式在现代遭遇了反思与颠覆。海德格尔领衔的存在主义,将“存在”(Sein)还原到“时间”(Zeit)当中;现象学将“现象”(而不是古希腊的本质或

实体)作为理性唯一的对象,最终将“时间性”(Zeidichkeit)引入空间当中。“存在”由历史之外的既定之物,变成了在历史延展性中的生成状态,这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通俗地说,因为这种转变,我们才有底气在今天的教科书中提出,我们所持的是辩证的、实践的、发展的观点,反对形而上学(古典本体论)静止的、二元对立的观点。这个眼光,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哲学所赋予的。

然而,晚近以来,鲍德里亚以“拟真”(simulation)为关键词的媒介理论,恰恰提出了一种取消上述时间性的、新的形而上学。“拟真”是一种符号模型先于真实的状态,用以形容当下成熟的资本社会中由吞噬一切的符号组成的媒介之网,代表了一种资本社会的新的总体性。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是第一性的,它们本身完整自足,不再表征某种实体或本质。

如果这里需要借助例子理解,则可以想元宇宙:在这种沉浸式媒介生存中,借由符号的重新编码,一切历史都可以再造,一切历史事件都可以从线性排列变为扁平铺开,金字塔和迪士尼可以同时出现,上帝与口红可以处于相同符号等级(刘文嘉此书中有许多鲜活的、当下的例子,见“第五章”)。也就是说,在拟真当中,既没有了古典本体论中万事万物背后的本质、实体,也取消了近代本体论的时间性,那么,“存在”到底是什么,又何以名状?

笔者觉得鲍德里亚难以明确回答,所以真实消失才最终成为其媒介批判的落脚点。这是一种对新资本控制方式的深入反省,也是对作为第一哲学的本体论的Call back。或者说,可能只有上升到本体论的层次,我们才能体会到媒介生存的深层痛感。

另一方面,他想用媒介来撬动对主体性的认识。

主客二分是现代人的基本视角,是一种日用而不觉的思维模式,这个模式到底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来自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它确定了一件事:主体性取决于自我意识的确定性。能动的、理性的自我成为了现代哲学的内核,客体则成为这种意识建构的对象。理性的张扬、能动性的强调,现代人思维方式的形成,某种意义上都从这里肇始。

笛卡尔所释放的主体性幽灵,越到晚近越引发哲学的纠结。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初的兴起,产生了将主体从“结构”当中驱逐出去的势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后裔在法国产生了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两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焦点就在于是人的革命力量在推动历史,还是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构关系在推动历史。在取消主体还是挽救主体、张扬人的理性意志还是遵循“科学”(结构)的纠结中,鲍德里亚开启了自己完全独特的“解决”之道。

如本书中所言,鲍德里亚的方

式可以喻称为“以退出游戏的方式参与游戏”。即是说——既然主体性已经不能挽救,那就干脆站在客体的立场上,将资本逻辑推演到极致,看看能发生什么——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致命的策略”。这个策略一旦建立,所有的问题都因为其破坏性迎刃而解,主体性哲学的问题被取消,本质与意义的阐释成为了虚无,符号的无限繁衍和超速增殖形成了一种吞噬一切的表面性。鲍德里亚站在意义和本质的反面,把全部理论身家押注在了表面游戏上。

这个策略最终最大化的展现在以“拟真”为关键词的媒介批判中。资本形成了消融主客的、流动着不断自我增殖的符号的扁平之网,最好的表征就是媒介。媒介成为了资本的新架构方式,现代人被压平到智能终端的屏幕当中,已无法将“本质”从媒介中剥离出来,也无法将理性、意志与媒介的统计和模拟分离开来,当然也就无法在这个平面之外去寻求革命性和批判性,唯有和拟真世界一起内爆。刘文嘉认为,鲍德里亚以退为进,以一种彻底反主体性的态度,为挽救主体性发出激烈的警告。

挽救主体性,在现实语境中,意味着始终对当下的媒介生存保持一种批判能力,保持对资本秩序的异质性。于2007年去世的鲍德里亚没有深入地经历社交媒体革命,但却以一种先知般的视野,描绘了这种完全沉浸式的符号世界,以及在



《拟真化生存——鲍德里亚晚期媒介批判理论研究》,刘文嘉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6月,48.00元

此世界中,时间性与否定性的消失。在元宇宙迎面向人类走来的时候,他留下的哲学问题也横亘在我们面前:这种趋势,到底是值得追求的,还是不可抗拒的?如果是后者,又该如何建立批判性维度?这正是刘文嘉此书最后的现实落脚点。

对本体论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虽然是《拟真化生存》一书的理论基石,但作者却并没有让此书囿于一种晦涩的哲学表达,恰恰相反,它的写法忠实于鲍德里亚所隶属的那个批判理论传统:朝向问题介入现实,保持哲学对前沿性问题的追踪,同时也保持向大众读者敞开的哲学入口。

苏格拉底讲“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反思中前行,这也许是人的宿命。作为哲学博士和亲手架构过移动端平台的资深媒体人,我感到本书作者可能是比较适合讨论媒介权力和主体命运这一时代课题的人。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宋元数理科学对日本江户科学的影响

■肖爱民

近读《17—20世纪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宋元数理科学的历史考察》(吕变庭、李金阁、冯立昇合著)一书,感慨良多。这部专著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20世纪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宋元数学科学的历史考察和文献整理”(项目编号:20&ZD228)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以吕变庭教授为首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所取得的又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黄金阶段,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科学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国宋元数理科学典籍从17世纪开始陆续传入日本。有学者将历代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所载科技书籍作过统计,发现宋代著作最多,这与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峰地位相适应。可惜,明清时期中国宋元科技文献流落国外的情况比较严重,如清人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所辑录的283种流落日本的中国古代文献中,大多是“中土唐宋逸籍,宋元旧槧”,像宋乾道本《梦溪笔谈》,朝鲜本《杨辉算法》《算学启蒙》等。毫无疑问,这些古代科技经典后来都成为江户时代日本科学发展的重要物质

载体。有学者坦言:“书籍是科学技术的栖身之地,同样也是信息资源的载体。”至少传入日本的中国宋元数理科学著作不仅成为“日本科学技术的栖身之地”,而且更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源泉。

其次,朱子学为日本江户时代的科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国内外学界一致认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物理学不仅仅是一门专业性的自然科学,它的基本观点还是人们自然观和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自然观和宇宙观是构成古今数理科学发展的基本理论前提。在日本,学界对宋元自然观和宇宙观的重视,是通过研究和批判朱熹哲学而逐步呈现出来的。朱子学虽然早在13世纪末即传入了镰仓中期的日本,但日本只是从江户时代才开始使朱子学走上独立研究之路。尤其是随着哥白尼地动说和牛顿力学传入日本,朱子学内含的自然科学属性被日本学者不断地挖掘、加工和改造,从而促进了日本数理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发展。在自然观方面,理气说无疑构成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古学派代表伊藤仁斋(1627—1705)在《语孟字义》(17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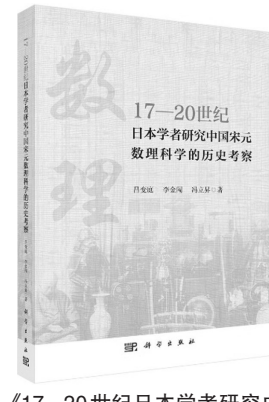
一书中批判了程朱理学的“理先气后说”,提出了“天地之间,一元气而已”的气一元论。贝原益轩(1630—1714)的《大疑录》(1714)则对新儒学提出怀疑,认为天地之间,都是一气。安藤昌益(1703—1762)的《自然真营道》(1752)更从朱熹的“理气说”中,别立“真气说”,并用“真气说”解释世界,展开生成论。三浦梅园(1723—1789)师承朱子学及古学派,又接触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他在《梅园三语》(写于1753年—1775年)中综合宋儒的“物”“体”“气”“性”概念,提出“气一元论”宇宙观。佐久间象山(1811—1864)进一步将朱子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相结合,强调朱子学的“格致之说”与“西洋穷理(即数理学)之科”的相通性。诚如有学者所言:“在日本,由于强调了理观念的经验主义方面,从而使朱子学与科学相结合。并成为接受西科学的基础。可以说,这是日本朱子学的一个特点。”

再次,中国宋元数理科学成为江户时代日本科学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从17世纪开始,中国宋元数理科学陆续向世界各地传播,给世界各国科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因子。此时,中国数

学主要是宋元数学也正赶上第2次传入日本,当时日本和算家关孝和(约1640—1708)积极吸收中国元术的思想精华,从而创造了“点算”术即依靠笔算的代数学,使日本特有的数学流派“和算”获得了空前发展。1658年久田玄哲对《算学启蒙》进行校点,1663年松村茂清著《算组》,这“实际上是一部将《算学启蒙》日本化的算书”。在天文历法方面,小川正意“得郭守敬《授时历》,私淑之,大有心得”,因而撰写了《新勘授时历》(1673)一书。依此为据,安藤有益著《东鉴历算改补》(1676),保井春海著《日本长历》(1680),关孝和著《授时发明》(1680)等。这些著作的出版成为日本改革历法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润川春海(后改名保井春海)的努力之下,日本幕府终于在1684年改行《大统历》,1685年颁行《贞享历》。尽管《贞享历》的内核是采用《授时历》的原理和方法,但至少从名义上结束了日本直接照搬中国历书的历史。此后,日本研究《授时历》出现了一个高潮,出现了许多研究《授时历》的著作,如小泉光保的《授时历图解》(1703),龟谷和竹的

《授时历图解》(1711),小泉卓松的《授时历注循环历》(1712),林子长的《授时历图解发挥》(1714),高桥至时的《授时历交食法》(1789)及《授时历日食法论解》(1802)等。于是,冯立昇先生分析说:“由于《授时历》包含有招差术、弧矢割圆法等高水平的数学知识,对这些数学知识的摄取和研究为和算开辟了新的方向,对关流数学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授时历》所含的数学知识也成为和算中的核心内容。”

综上,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中国宋元时期的数理著作主要通过下面几个研究中心来传播。我们知道,江户时代的日本形成了以京都、江户(东京)和大阪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出现了以艺道为特征的町人(即工商业者)文化现象,提倡人文精神,重视古典文化的重视,庶民文化大量出现,工艺、自然科学发展,这种社会风气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非常相似。与之相应,以关孝和为核心的关氏学派,成为推动和算独立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即使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迅速走向现代化,但是中国宋元数理科学仍然具有久经不衰的学术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日本研究者或爱好



《17—20世纪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宋元数理科学的历史考察》,吕变庭、李金阁、冯立昇著,科学出版社2022年3月,158.00元

者去探幽解密。从这个意义上,诚如美国学者李克特所言,科学确实是一种文化过程。有鉴于此,日本数学史家远藤利贞在《增修日本数学史》一书将考察中国天算科学对东邻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向前推演,认为其持续时间之长与古代中国文化交流史相侔。这是因为:第一,直到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仍然注重学习中国的天算之学,其不少新成就也是在充分吸收中国营养的基础上取得的。第二,当时日本人对西方天算及其他新知识了解,也有许多是通过阅读中国人的译介材料简介得到的。所以从历史发展的长远影响来看,中国宋元数理科学事实上成为日本科学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起点基础。

写在大地上的作品

■李朝全

为了采写反映山西全省脱贫攻坚战的纪实文学,作家鲁顺民、陈克海多次冒着严寒,深入村庄和农户细致地采访,写出了包括《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在内的多部纪实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山西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进程,为新时代存留了一份重要的文学“史记”。

长篇纪实《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首发于《中国作家》,后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是该社组织的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丛书“十村记:精准扶贫路”中分量最重的作品之一。

这部作品确是一件细活,就像解剖小麻雀,作者把山西省岚岚县赵家洼这个小村子“挖掘”得底朝天,采访和书写都特别细致。用解剖一座村庄脱贫之路为样本,折射和反映中国广大农村脱贫攻坚的艰难历程以及农民生活的历史性变迁。鲁顺民一直以来都在关注“三农”问题,关注农村农民的生活状态,写了包括《380毫米降水线》《天下农人》等在内的一系列的“三

农”题材作品。这,跟他深厚的农村情结关系密切。他的写作有个突出的特色是别人少有的,这就是他喜欢记细账,作账本式的描述。比如,一个农户一年有多少收入,每一笔都记录得非常翔实。在《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中也有大量账本式的记录,譬如,国家给贫困户的政策帮扶款和优惠待遇:爱心煤费一年二百元,退耕还林补助每亩五百元,光伏发电分摊给老百姓一年三千元……这些细活,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功,也体现出了作家的用心、用情和用功。

这部纪实非常特别。这是一部写在大地上的作品,它细致地书写了一座村庄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富有哲理性的意味。在作者笔下,赵家洼这个村庄是一个拟人化的存在;这个村庄是“谁”,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宏大的哲学问题。赵家洼村看起来很小,微不足道,在物理上、地图上已经消失,只剩下一个名字,村里的人都已经离去,变成了一个空村,土

地也都复垦或退耕还林了。但是,那些离去的人们又重新聚居开始了新的群体生活。因此,这部作品实质上是一个具有哲学价值的文本。这块黄土地上的人们原来追求的只是能够养活人。而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在两位作家笔下,我们看到老百姓又想逃离这块土地,去寻求新的、更好的生活。1980年代时他们去乡镇企业打工,“离土不离乡”。到了1990年代以后,更多的农民进城打工,特别是年轻人也都走光了,村里就只剩下“389961”居民。这时候,农民进城打工就是“背土离乡”,不光离开了土地,而且离开了家乡。作者通过对赵家洼的解剖,也解剖了中国近几十年的农村变革变迁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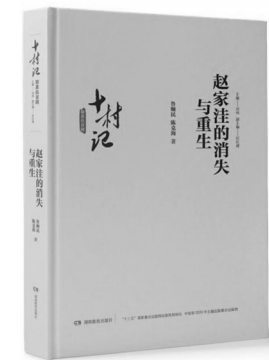
赵家洼在2017年以后,剩下的6户人家也通过易地搬迁离开了土地,进入城镇生活。作家也写到了他们如何安居,如何就业,开始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确立新的生活定度和方向,开启新生活。这其中,国家扶贫资助的力度非常大,更重

要的是,国家要通过脱贫攻坚的大决战,充分发挥老百姓自身的潜能,不养懒汉,这是很可贵的。

作品虽然只写了一座村庄的消失,但我认为,一座村庄的消失,或许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事件。作者写下了一部村庄的历史和地方志。对于赵家洼村来说,这是一部完整的村志村史,但是赵家洼这个村庄的消失,可能还具有寓言的意义,映射出中国最近40年的大变迁、大变革。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来自于农村,这部讲述一座村庄消失与重生的故事的纪实,势必引发读者沉思:我们今天的农村还好吗?农村会不会消失?那些能够寄托我们的乡愁的所在,中国大地上那些广大的农民,特别是种粮食的农民会不会消失?……这些思考体现了作品思辨性的特点。

口述实录,让农民自己说话,用农民自己的话说,也是顺民和克海写作的一大特色。书中人物都是用自己的话说,用当地人的特色语

言崾崿话说。譬如,“捉主意”,“一年到头闹个4万,刨掉害债,也剩不多”,“东刨一爪,西楼一耙”……众多地方性语言的适度运用都很生动,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因为这些内容都是第一手的,是农民自己的讲述,这种讲述很鲜活。作品通过这种口述实录式的书写,讲述了多姓杂居的村落是怎样形成的,每个姓氏家族是怎么来的,他们的迁移史发展史,具体而微地记录了一户人家的家族史,并且把家谱和方志结合了起来。两位作者显然有着鲜明的写史意识和追求。如果说赵家洼是一棵树,那么,这一个姓氏就是这棵树上的一个农民就是树枝上的一片树叶;反过来讲,如果赵家洼是中国这棵大树上的一片树叶,那么崾崿就是树上的一根枝杈,它们的治理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体现了我们的国家是如何摘掉贫困的帽子走向小康的。因此,这也是脱贫和全面小康的记录,这是



《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鲁顺民、陈克海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种口述实录的独特价值。

这部作品的价值显然已溢出文学。它具有史志的价值、文献的价值。它既是一部扶贫志,也是一部脱贫记,是一部全面小康记录。毫无疑问,赵家洼的脱贫过程被两位作家很好地记录了下来。其次,这也是一部村庄史,它探讨了中国最微小的行政区划单位村的发展变迁史。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也有人口迁移学、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的价值。两位作家花那么多时间,写了这样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种记录和书写令人肃然起敬。